

Lingnan University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2002-2003

神話與文學論文選輯 Collection of Theses on
Myth in Literature

2003

理水(魯迅《故事新編》)

余嘉賢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chin_proj_1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余嘉賢 (2003)。望安 (鍾玲《生死冤家》)。輯於《神話與文學論文選輯 2002-2003》(頁243-253)。檢自：
http://commons.ln.edu.hk/chin_proj_1/1/

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神話與文學論文選輯 Collection of Theses on Myth in Literature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2002-2003 by an authorized administra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理水》

魯迅——有「匕首」、「投槍」美譽的五四文壇傑出作家。他善於創作諷刺時弊的作品，其作品《狂人日記》和《阿Q正傳》更是一鳴驚人，並奠定他在中國文學史上的不朽地位。其主要作品還有《吶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花邊文學》等。然而，在他的創作中，以古代傳說、神話和歷史事實為題材的，就只有一本《故事新編》。

《故事新編》是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三五年期間寫成的歷史小說集。魯迅曾講述整體構思《故事新編》時的境況：「1926年秋天，一個人住在廈門的石屋里，對著大海，翻著古書、四近無生人氣，心裏空空洞洞。……這時我不願想到目前，於是回憶在心裏出土了，寫了十篇《朝花夕拾》；並且仍舊拾取古代的傳說之類，預備足成八則《故事新編》」當時，魯迅因支持北京學生的愛國運動，而被北洋軍閥政府所通緝，故逃到廈門，其後以古代傳說為題材，寫了《故事新編》。何以作者會創作《故事新編》呢？姜振昌學者在《故事新編與中國新歷史小說》中補充了魯迅作《故事新編》的原因和心境：「想暫時回避激烈的時政爭鬥卻又難以忘卻現實，於是便以這獨特的方式向社會作『調侃』式的搗亂，以排遣自己看似輕鬆實則不可重負的感受。」由此說明，魯迅對當時政治有所不滿，但又不敢直斥其非，故結合上古傳說而創作《故事新編》，藉以透過縱容不迫的方式來帶出政治實況。

《故事新編》中的《理水》寫於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收入《故事新編》前未曾在報刊上發表過。《理水》乃一篇洪水故事，取材於上古大禹治水的神話。最早的洪水神話出自蘇美爾民族的方舟神話。後來，巴比倫國滅了蘇美爾民族，並把其方舟神話改編為自家的洪水神話。其後，希伯萊的《挪亞方舟》神話繼承了巴比倫的方舟神話。而由於貿易關係，這些洪水神話不斷流傳至印度、希臘等世界各地，而不同國家又根據自己民族的風尚習俗來改編洪水神話，故有不少富有民族特色的洪水神話湧現。

中國史上最早的洪水神話見於《山海經》的鯀禹治水神話。根據《山海經》的記載：「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命祝融殺鯀於羽郊。鯀復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說明宇宙洪水肆虐和鯀禹治水的始末；《孟子·滕文公上》亦記載了洪水的情況：「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傷人。哭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由此可見，堯之時洪水為禍的情況。後來鯀知帝有生長不息的土壤，便暗中偷竊息壤以湮塞洪水，「滔滔洪水，無所止極，伯鯀乃以息石息壤，以填洪水。」（《山海經·海內經》）可是帝知道鯀竊息壤，便命火神祝融殺鯀於羽郊，並奪回利剩餘的息壤。由於鯀治水的心願未能達成，故死後三年屍首不腐，並生下禹。後來，帝以息壤贈禹，並派遣他去治理洪水，《淮南子·地形篇》亦有所記載：「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為名山。」治水期間，河伯授禹治水地圖、伏羲贈禹玉簡以量度大地、神龍畫地以疏導洪水、烏龜背息壤以填淵，在各方神靈的幫助下，禹才得以成功治平各地的洪水，並「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史記·夏本紀》）除此之外，據《楚辭·天問》所記禹為了專心一致治水，故成親四天便離家趕往治水：「禹娶塗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孟子·滕文公》亦言「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史記·夏本紀》亦

說：「禹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而不入。」由此觀之，禹決心治水的忘私精神。

《理水》說的是大禹治水的故事，主要以鯀禹治水的神話為藍本。魯迅以古代大禹治水的神話結合現實生活為題材，透過頌讚大禹為民請命、獻身事業的精神，以抨擊現實社會中的醜惡現象。文中既狠狠地揭露了國民黨禍國殃民的罪行，亦諷刺了官場學者為統治者效勞的嘴臉。《理水》的材料大多出於《史記·五帝本紀》和《夏本紀》，而《史記》又多本自《尚書》的《堯典》、《舜典》、《洪範》、《大禹謨》、《益稷》等篇。此外，《山海經》、《淮南子》、《論語》、《莊子》、《孟子》以及《楚辭·天問》也有記述大禹的事蹟。《理水》便取材自以上古籍的資料，再加以增刪、改編而成。

究竟是什麼東西觸動魯迅創作《理水》呢？這與當時的社會實況和政治現實有密切關係。在三十年代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正是水災頻繁的年代，每到雨季，江河便會泛濫成災。而一九三一年夏季的全國大水災便是《理水》的主要背景。當時水災極為嚴重，長江、淮河、黃河、漢水相繼泛濫。因堤防失修而洪水泛濫的省份達十七個，災民達一億人之多。面對洪水的肆虐，政府亦束手無策，故人民只好提取堤坊基金修堤。可悲的是，數萬元的基金已被有關當局用作販賣鴉片，而疏導淮河的基金也被充作內戰的經費，故水災不斷蔓延。同時，政府向各地收集來的數百萬元捐款，用在救災的竟不及萬分之一，幾乎全數被當局的官員中飽私囊。除了三一年的水災，三三年又有黃河決口，導致河北、河南、山東、陝西、安徽及江蘇北部水災嚴重，而伴隨著水災而來的傳染病亦不斷蔓延。魯迅看透水災背後的實情，故創作《理水》以揭露和諷刺政府的腐敗無能和大員借水災侵吞公款的罪行。

另外，國難當前的文化界又怎樣呢？以故適為代表的知識分子號稱「名流學者」、「文化人」，卻在國難當前大發「人口過量」的謬論，或鼓吹靈性幽默，或提倡「考古」，既對現實避而不談，更為統治者開脫罪責，粉飾太平。文人學者助紂為虐的行為令魯迅為之痛心疾首，故希望透過《理水》加以諷刺他們的劣行。

除了內憂，中國亦面臨外患的危機。適逢國內政局黑暗、民生凋零，日軍便加緊侵略中國，而「一二八事件」和「九一八事件」更加促了國土的淪喪。面對國家的淪陷，魯迅為之黯然神傷，故決心揭露害及國家的罪魁禍首，望能引起各界關注，從而挽救國家。

從以上所見，三十年代的中國內憂外患深重，天災人禍不斷。因此，魯迅創作《理水》以表達他對當前局勢的不滿。作者在文中描寫洪水肆虐、生靈塗炭，但達官貴人依然過著歌舞升平的生活，藉以揭露政府的腐敗無能、不顧人民死活的現實情形。另外，水災的關係，令魯迅聯想到古代的治水英雄——大禹。大禹為了戰勝洪水的侵害，不斷艱苦奮鬥，他曾言「我若不把洪水治平，我怎奈天下的蒼我？」可見其治水的抱負是何等的遠大。由於他這種不屈不朽的意志有鼓舞人心的作用，故作者在文中讚頌大智大勇、公而忘私的大禹，意在借古代英雄人物的精神激勵現今國民的自強意識。這種自強意識不單是為戰勝洪水，更是針對當前局勢而言。因為當時局勢黑暗腐敗，魯迅認為有必要挽救淪陷的國土，故以「治水」象徵拯救中國的危亡。由此可見，作者欲透過塑造大禹這個人民的英雄形象，以喚起人民的

信心和戰鬥精神。另外，作者在其作品《中國人失掉自信心了嗎》中，曾說：「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拼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雖是等於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這段話對於我們了解《理水》的寫作動機，是有點兒幫助的。這句話是作者在一九三四年九月說的，後來他便寫了《理水》，可見他是有目的、有意識去塑造大禹這個「中國的脊梁」式的人物形象，藉以透過「脊梁的人物」去喚起人們的民族意識。

《理水》是改編古代的神話以影射現實社會，故文中有大量諷刺現實的內容。作者在文章起首便對不愁衣食的學者、紳士們加以諷刺。水災當前，百姓在死亡線上痛苦地掙扎，但學者們不做實際的救災工作，反而聚集在文化山上大發謬論「連學說也就壓倒了濤聲了」，這些文人學者，實是三十年代學者文人的影子。文中的苗民言語學家作為學者們的代表，竟然向視察災情的水利大員匯報說「災情倒並不算重」。當然，他們不會想到受水災困擾的老百姓的苦難辛酸，因為他們為奇肱國所參養，食糧是每天源源不絕從奇肱國用飛車運來的，所以肚子不餓，更有閒情逸緻代表他們的主子來研究學問。他還認為洪水帶給他們吃不完的鮮魚，又說下民有的是榆葉和海苔，更罵他們「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然而，在災難中的百姓又怎能「飽食終日」呢？由此可見，這位學者信口雌黃，把飢民的苦難說成享受清福。

另外，神農本草的學者認為下民吃的海苔裏中有碘質，可醫治療癆病。癆癆病是指淋巴腺腫，為結核杆菌的侵擾所引起的。不過，諷刺的是研究醫書的學者竟說出這樣的謬論來，因為含碘的海苔只能有助於治療甲狀腺腫大，對淋巴結核是無能為力的。更何況人體需要的碘主要是從水和植物中取得，對於終年以海苔為食糧的老百姓來說，他們並不缺少碘，更不用說依靠海苔來治病了。這位學者還把疾病的流行歸結於人民的過錯，他說下民的飲料「一萬代也喝不完，可惜含一點黃土」認為飲用前應該蒸餾一下，但飲水者冥頑不靈，沒有接受他的指導，以至弄出數不清的病人來，可見這位學者把疾病的主因歸咎於的人們的疏忽，而不是尋找問題的根源所在，實是一位有名無實的學者。

文中的紳士更向大員匯報說，水災與政府無關，主要是下民們的過錯，因為「水還沒有時候，他們懶著不肯填，洪水來了的時候，他們又懶著不肯戽」，由此把水災的原因推在人民身上，又不想想自己也是水災的罪魁禍首之一，可見紳士對大員的奉承和不負責任的說法。

每當奇肱國的人運送糧食給山上的學者時，便會以英語和學者們溝通，例如：「古貌林」(good morning)、「好杜有圖」(how do you do)、「OK」等，相方的英語對話正有力地揭示了文化山上的學者們是侍奉東洋家的。因此，奇肱國贈送糧食的舉動便象徵了帝國主義的侵略，特別是英美帝國主義政策，故文中的學者實是附屬帝國主義及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以提倡和宣揚帝國主義思想文化為職責。

魯迅亦大膽地借用文中的學者來諷刺現實中的學者文人。首當其衝的便是以潘光旦為代表的遺傳學者，文中拿拄仗的學者便是他們的化身。潘光旦曾根據官僚地主家族的家譜來解釋「遺傳」，並寫了《明清兩代嘉興的望族》，他的化身在文中說：「我曾經搜集了許多王公大臣和豪富人家的家譜，很下過一番研究工夫，得到結論：闊人的子孫都是闊人，壞人的子

孫都是壞人——這就叫作『遺傳』。」因而他敢於質疑大禹治水的成效，因為依他的理論「鯀不成功，他的兒子禹一定也不會成功，因為愚人是生不出聰明人來的！」由此可見，遺傳學者甚強調血統論和優生學，認為愚人的子孫永遠也是愚人，不會有所作為。而言外之意也是說，治水失敗並非統治者的錯，而是鯀和禹的錯。從以上所見，他們以遺傳學為統治者壓榨老百姓開脫罪責，故這群遺傳學者實是為腐敗的統治階級效勞和辯護的。此外，魯迅在《運命》一文亦指出古今聖賢以運命說來教人安分守己，「倘使無法指定究竟的運命，總不能令人死心塌地。現在的優生學，本可以說是科學的了，中國也正有人提倡著，冀以濟運命說之窮」作者以此啓示我們，資產階級的優生學和封建階級的運命說是合流的，目的是為抵制無產階級所領導的民主革命。

魯迅在文中亦巧妙地運用鄉人諷刺了胡適派的考據學家顧頡剛。顧頡剛曾在一九二三年發表了「禹是一條蟲，鯀是一條魚」的謬論，但他根據的，不過是「禹」字從「蟲」，「鯀」字從「魚」的荒謬考據。因而文中的他亦荒謬地認為禹是一條蟲、鯀是一條魚，蟲和魚既非人，更不會治水的。後來魯迅借鄉人之口「以其人之道還治人之身」去反駁他的謬論：「你叫烏頭先生，莫非真的是一個鳥兒的頭，並不是人嗎？」魯迅是根據「顧頡剛」的「顧」字來考據的，「顧」從「雇」從「頁」，而「雇」是鳥名，「頁」是頭，故認為「顧」即是鳥兒的頭。鄉人用反詰的方法駁倒了烏頭先生，既尖銳地揭穿其謬論，亦證明了禹並非蟲，而是確實存在的一個人。

烏頭先生被一個沒有家譜的鄉人嘲笑，在理屈詞窮下，堅決要和鄉人到臬陶大人那裏「法律解決」，更命他「不要動，等我吃完了炒麵」，但鄉人的回答是：「你是學者，總該知道現在已是午後，別人也要肚子餓的……等您上了呈子之後，我再來投案罷。」其實，魯迅以大篇幅敘述烏頭先生和鄉人的鬧劇亦只為諷刺顧頡剛的行為。顧認為魯迅在文章上誣陷他是反革命分子，故於一九二七年七月在杭州致函魯迅，並言：「……先生對於頡剛竟作如此烈之攻擊……頡剛所作之罪惡直為天地所不容，無任惶駭。誠恐此中是非，非筆墨口舌所可明，擬於九月中回粵後提起訴訟，聽候法律解決。」他更理直氣壯地說：「如頡剛確有反革命之事實，雖受死刑，亦所甘心，否則先生等自當負發言之責任。」顧深知魯迅即將離開廣州，卻囑咐他「暫勿離粵，以俟開審。」後來，魯迅在回信中語帶嘲諷地說：「如命，則仆尚須提空囊賃屋買米，作窮打算，恭候偏何來遲，提起訴訟，不如命，則先生可指我為畏罪而逃也……江浙俱屬黨國所治，法律當與粵不異，且先生尚未啟行，無須特別挽聽審，良不如請即就近在浙起訴，爾時僕必到杭，以負應負之責。」信中指出顧的做法是有意留難他的。因為他已決定八月中離開廣州，但顧卻要他留在當地待九月上庭；再者，他深知廣州的生活費十分昂貴，如住下去便要「典書賣褲」，若不從顧命，便會被指畏罪潛逃。因此，他在信中揭穿顧之「詭計」後，便如期離粵，更聲明待起訴後再行投案，以負應負之責。由此觀之，魯迅借鄉人嘲笑學者連別人也會肚子餓的常識也沒有，以諷刺顧頡剛之流把別人當作笨伯、愚人的行為。

從鄉人和烏頭先生的鬧劇中，既見學者的愚昧，亦體現了鄉人的智慧，多次識破學者的謬論，這正好說明魯迅對人民力量是寄於無限信任的。他亦曾說：「誠然，老百姓雖然不讀詩書，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裏覓道。但能從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

決非清高通達的士大夫所可企及之處的。」(《「題未定」草之九》)指出人民群眾雖然學識不高，但有足夠的覺悟能力，大都能明辨是非，識破統治階級的詭計。

另外，作者又借用文中八字胡子的伏羲朝小品文學家來諷刺林語堂。這個歐化紳士竟在國難當頭大寫性靈幽默、風花雪月的小品文，文中的語錄式文言「吾嘗登米爾之原……面有蚩尤氏之霧」正是魯迅模擬他們語錄體小品文的語氣。其實，魯迅是以這段文字來諷刺林語堂等人提倡的「語錄體」小品文。當時不少資產階級、文人學士紛紛踴躍參予反動勢力的「提倡復興文言文的行動」，林語堂等人更是不遺餘力。林語堂在反對白話的文章中說：「吾惡白話之文，而喜文言之白，故提倡語錄體」(《論語錄體之用》)既然是文言，那就是脫離人民口語的文字，而這種文字又局限於上流社會才能學到。因此，資產階級、文人學士鐘愛這種貴族文字，便足以證明他們仍羨慕封建階級的壟斷文化，更意圖借提倡文言文以恢復封建制度。

此外，當時北平文教界的學者亦成爲魯迅筆下的諷刺對象。文化山上的學者極之尊崇文化，認爲「文化是一國的命脈，學者是文化的靈魂，只要文化存在，華夏也就存在，別的一切，倒還在其次……」後來水利局的官員在商討水災的善後方法時，打算將這些學者接上高原來，以使奇肱國知道他們的尊崇文化，那麼每月的接濟便會送到這裏來。學者的「文化救國論」實是影射當時北平文教界的學者，如江瀚、劉複、徐炳昶、馬衡等三十餘人。他們在一九三二年日軍大舉侵略之時，上書向國民黨政府建議定北平爲「文化城」。那時日本帝國主義已經侵佔我國東北和華北，於是政府便實行投降賣國政策，拋棄東北後，又準備從華北撤退，並把值錢的古文物從北平遷到南京。可是，江瀚等人想阻止古文物南移，便以北平在政治和軍事上均沒有重要性爲理由，向當局提出撤除北平的軍備，把它劃爲一個不設防的文化區域。他們在意見書中說，北平有很多珍貴文物，它們「是國家命脈，國民精神寄託之所在……是斷斷不可以犧牲的」；又言北平有種種文化設備，故全國專門的學者才會聚首北平，倘若把設備挪開，那些學者便會隨之四散。因此，他們要求政府定北平爲「文化城」。可是，魯迅認爲撤除一切軍事設備就等同賣國投降，讓敵人不費吹灰之力便可攻陷，故他對文教界學者提出的建議甚爲不滿。雖然當時國民黨政府尚未公開定北平爲「文化城」，但最後也把它拱手讓給了日本。因此，魯迅便以學者的「文化救國論」來批評知識界的各種有害思潮和荒謬學說。

魯迅乃一名敢怒敢言的作家，善於把社會的弊病訴諸於文章之中，對無能昏庸的官員也絕不手下留情。在描寫水利官員時，作者極力刻劃了他們出場的氣勢「一大陣獨木舟的到來……每隻船上，有二十名官兵打槳，三十名官兵持矛，前後都是旗幟……過了大半天，這才從最大的船裏，有兩位中年的胖胖的大員出現，約略二十個穿虎皮的士簇擁著。」官員這樣虛張聲勢地考察災情，目的在於向人民示威、出風頭。儘管民族命運岌岌可危，但大員根本無心問及災情，在災區的五天，只是借視察爲名而遊山玩水、吃喝玩樂：第一天在石屋中聽學者和紳士們胡說八道；第二天聲稱路上勞頓，不辦公也不見客；第三天去賞古松、釣黃鱗；第四天又稱考察勞頓，不辦公也不見客；直到第五天的午後才傳見下民，可是，打了幾個呵欠之後，甚麼問題也沒解決，只著下民寫個公呈，但當他知道下民不會寫字，便著他把吃的東西送來便可。由此觀之，他們不過是一伙無恥的貪官污吏，借視察以出風頭，借救災而謀私利。

後來，在商討水災的善後方法時，大員提出開展覽會募捐的計劃，可是，這些籌款計劃在國民黨的統治下也幾乎成了司空見慣的斂財方法。魯迅也說：「這些用汗血求來的公錢，大抵反以供虎狼的一舐。」（《保留》）指出政府發起的募捐實際上是一種敲詐勒索，捐款決不會落到災民手中的，故募捐計劃只是一場斂財把戲。

另外，作者亦諷刺了國民黨在國難當頭、民不聊生的三十年代的倒行逆施行爲。文中的學者乃國民黨的化身，認爲「文化是一國的命脈，學者是文化的靈魂，只要文化存在，華夏也就存在。」於是水利大員便打算把學者們接上高原來，從而令奇肱國人知道他們的尊崇文化，那麼每月的接濟便會送到這裏來。「尊崇文化」可以得到外國的青睞，是因爲這裏所說的文化是指帝國主義文化和封建文化。學者把這種文化抬到國家命脈的地位，而他們自己也就成了這種文化的靈魂，這充分表明了國民黨是奉承帝國主義文化的奴隸，從而暗示水利大員優待學者的行爲有顛覆國家之嫌。

文中的洪水象徵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所造成的民族災難；而治水的工作當然象徵了拯救中國危亡的革命運動。因此，反對治水的官員就是維護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資產階級，他們反對禹、否定禹是因爲禹要來治理洪水，要來改變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苦難命運。正因爲這群製造民族災難而又害怕民族解放的守舊派的反對，致令改革工作一拖再拖，故魯迅在文中便借治水諷刺這群反對改革的守舊派。皆因魯迅認爲治水就象徵拯救中國的危亡，所以不論治水或治國皆要進行革命、革新才有出路，才能改變民族的悲慘命運。

水利局大員提不出真正的治水建議，只一味反對禹提出的「導」，並千方百計阻止新法。他們實是一群不折不扣的守舊派，對革新的事物堅決反對，只懂得維護自己的地位和利益，借以逃脫革命的威脅。他們認爲「導」是「蚩尤的法子」，據《山海經·大荒北經》載：「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應龍蓄水，蚩尤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乃殺蚩尤。」傳說中，蚩尤乃九黎族酋長，他借水的威力攻打黃帝，更借助風伯雨師呼風喚雨，幸帝及時命旱神止雨，才能避免這場洪水災害。蚩尤既然借水攻打黃帝，故不管水災如何，他也不會提出治水的法子，故後人便以「蚩尤的法子」喻行不通的方法。守舊派引用這個神話，意在說明「導」並非治水的好法子。由此可見，反對革新的守舊派把攻擊的矛頭指向中國共產黨，認爲跟共產黨走即所謂「尤化」，作爲一個十惡不赦的罪名，借以威嚇群眾，抵制革命。

保守官員又認爲禹採用新法是有違孝道的，因爲「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既然禹的父親鯀用過「湮」的方法，後人也應繼續沿用舊法，不得更改。魯迅在這兒引用儒家推崇的孝道，目的是揭露國民黨利用孔孟之道來反革命、反人民。他諷刺袁世凱等人用跪拜禮來舉行祀孔大典，又影射北洋軍閥妄圖以憲法定孔教爲國教。魯迅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中言：「超越便須改變，所以子孫對於祖先的事，應該改變，『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當然是曲說，是退嬰的病根」藉此諷刺反對改革的守舊派是造成民族災難的罪魁禍首。

另一位大員提出了《周易》中「幹父之蠱」的事來諷刺大禹。三國時魏國王弼注：「幹父之事，能承先軌，堪其任者也。」大員引用這典故以暗示禹用「導」治水並非只爲完成父

親的遺願，實是爲了掩蓋父親鯀以「湮」治水的失敗。此外，有些大員甚至反對任何變革，更堅持「『湮』是世界上已有定評的好法子」，故將改革措施一律斥爲「摩登」，因爲他們十分尊崇孔孟之道，故認爲改革會違反孔孟主張的復古行爲。

除了刻劃學者和貪官污吏外，作者亦花了不少篇幅去描寫下民的代表。在作者的筆下，文中的下民便成了典型的奴隸樣板。當他被大員們呼喚時，便害怕得兩腿立刻發抖；在官員面前，又不敢抬頭看清楚他們的相貌；而被問及「過得還好麼？」時，竟左一句「托大人鴻福」，右一句「托大人的福」；待到被讚「老實」後，膽子大了，便主張要用水苔做「滑溜翡翠湯」，楓葉做「一品當朝羹」，可是官員並不愛聽，更頻打呵欠。而爲了做進呈的盒子，下民更乞求學者給他寫上「老實堂」，但學者們都看不起他，只爲他寫了「壽山福海」。作者從多方面把下民奉承的奴隸形象呈現出來，但他並非以嘲笑的語氣去寫，而是持嚴肅的態度，因爲他批判下民的目的是想進一步揭露統治者的罪惡，故矛頭是直指水利局官僚和官場學者的，正因爲他們的愚弄和蒙蔽，對人民產生了作用，所以才有這些奴隸的出現。

另一方面，篇中的大員爲了顯示自己學識的廣博，便從「愚民」的話題拉扯到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英國戲劇家莎士比亞頭上，這兒實是魯迅對擁護莎士比亞的現代文人的諷刺。三十年代的現代評論家陳西滢、徐志摩等經常標榜只有他們懂得莎士比亞，如陳西滢在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一日在《晨報副刊》發表了《聽琴》，文中說：「不愛莎士比亞你就是傻子。」而徐志摩在同月二十六日亦發表了《漢姆雷德與留學生》，文中言：「去過大英國的留學生才能講他的莎士比亞」，別人「不配插嘴」。其後杜衡在一九三四年六月《文藝風景》創刊號發表《莎劇凱撒傳裏所表現的群眾》一文，也借評莎士比亞來誣蔑人民群眾「沒有理性」，「沒有明確的利害觀念」等等。因此，魯迅描寫大員提到莎士比亞的一節，實是影射陳、杜等人的言論。

魯迅除了借《理水》以諷刺現實社會外，亦描寫了大禹的民族英雄形象。文中的大禹雖然著墨不多，卻是魯迅衷心贊美的人物，故在塑造禹的形象時，作者注入了多方面的內容。在外貌方面，作者以白描手法寫大禹「面目黎黑」、「衣服破舊」、「粗手粗腳」以此說明他乃一名勞動者，因而面目黑瘦，身穿破舊衣服；另外，作者筆下的大禹，舉止作風甚爲大膽、不拘小節，當他到了宴會，便「一徑跨到席上……大模大樣」、「並不盤膝而坐，卻伸開了兩腳，把大腳對著大員們，又不穿襪子，滿腳底都是栗子一般的老茧」這些都展現了一個腳踏實地、不拘繁文縟節的群眾領袖形象。而禹把大腳對著大員這一節，就生動地刻劃出他對貪官污吏的蔑視。

就性格而言，魯迅筆下的大禹比神話中的大禹更爲多樣化。從禹的行爲，我們可以間接看到他敢於突破傳統、埋頭苦幹和公而忘私的性格。在治水時，他能處處傾聽百姓的意見，並深入實地考察災情；他亦能汲取歷年治水失敗的教訓，打破傳統「湮」的治水方法，而改用「導」。儘管保守官員堅決反對新法，更以「蚩尤的法子」、「孝道」、「幹父之蠱」來諷刺他，但他毫不妥協，更斬釘截鐵地表示：「已經看透實情，打定主意，無論如何，非「導」不可！」由此可見其銳意革新、大智大勇、堅持鬥爭的性格。再者，他爲了拯救災難中的人民，便置個人和家庭私利於度外，「討過老婆，四天就走」、「生了阿啟，也不當他兒子看」，甚至三度

經過家門也不進去，他這種公而忘私的性格真令人佩服呢！此外，他爲了戰勝洪水給人民帶來的災禍，於是每天率領隨員攀山涉水、視察災情，並疏江河，引洪水入海，他這種埋頭苦幹的精神，成爲他治平洪水不可缺少的條件。他不僅排除水患的災害，還多方設法「調有餘，補不足」以改善人民生活，這些都充分體現了禹爲人民謀利益的獻身精神，從中更見其爲民赴湯蹈火在所不惜的高尚品德。無可否認，在三十年代內憂外患的中國，禹這種無私無畏、爲民請命的性格的確給人們很大的動力，激發了國人的自豪感和自信心。

《理水》在藝術上也有其獨到之處，而最引人注目的莫過於「油滑」式的寫作技巧。「油滑」是指在描摹古代題材的同時，穿插現代生活的情節，從而達到古今融合的效果。姜振昌學者在《「故事新編」與新中國歷史小說》亦爲「油滑」下了一個明確的定義：「將自己所處時代的事相、瑣事甚至語匯織入小說中與歷史直接會面、並且信手拈來、縱意鋪陳、議論、擗弄，幾乎是很主觀很隨意的行爲」。那麼爲何作者要採用「油滑」的寫作方式呢？這是因爲當時反動派白色恐怖非常嚴重，短文也幾乎無處發表，更何況是直接批評現實的長文呢？故作者只好以油滑的方式來掩飾他對社會的諷刺。在文中所見，文化山上的學者大都懂現代的英文和術語，如「古貌林」、「好杜有圖」、「OK」、「維他命 W」、「莎士比亞」、「法律解決」等，這些都違反了歷史生活的真實，除了給讀者滑稽、怪誕之感外，亦暗示了帝國主義的侵略，尤其是英美帝國主義政策。另外，油滑的語言亦讓現實生活的人們產生聯想，如由飛車聯想到飛機；由「文化山」想到「文化城」，想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中國。由此可見，油滑語言的目的是指出社會上的種種痼疾，以激發人們的熱情，從而改變黑暗的社會現狀。

在塑造人物方面，作者亦巧妙地運用人物的言行來構造人物的形象。如文化山上的學者和奇肱國人的英語對話，充分地表明了學者是侍奉東洋家的；而時髦的優生學理論可見學者們是深受西方文化所影響；大員嘴裏的「莎士比亞」、「榆葉裏含有維他命 W」都塑造了大員自命不凡和賣弄知識的形象。

另外，文中的鳥頭先生提出禹是一條蟲，鯀是一條魚，蟲和魚不能治水的理論時，是口吃得連鼻尖也脹得通紅的。然而，在往後的爭辯中，他態度雖然橫蠻無理，卻並不口吃，而在對鄉下人提出法律解決的威脅時，竟一點也不口吃。魯迅刻意描寫鳥頭先生口吃的特徵是爲了表現出人們運用陰謀時就訥訥不已，計定謀成不再口吃的人性等質，因些，口吃這種特徵並非隨意加在鳥頭先生身上的，而是作爲一種揭露本質的手法。

此外，作者亦運用了對比手法，令到人物形象更爲鮮明突出。在外表方面，作者描寫大禹和他的隨員「面目黎黑」、「衣服破舊」、「一排黑瘦的乞丐似的東西，不動，不言，不笑，像鐵鑄一樣」，而大員們則是「白鬚髮的、花鬚髮的、小白臉的、胖而流著油汗的，胖而不流油汗的官員們」可見大禹和隨員的粗獷形象與油光滿面、腹大便便的大員們造成強烈的對比，以此突出大禹們乃勞動階層，而官員們則是肚滿腸肥的貪官污吏，繼而暗示官員們只顧自己溫飽，不諳民間疾苦。

另外，作者亦以對比的手法刻劃了大禹和官員對水災的態度。水災當前，大禹及隨員們沐風浴雨、埋頭苦幹地進行拯救工作；可是，官員卻藉考察災區而遊山玩水、吃喝玩樂。於

是作者便從兩者對水災的極端態度著手，從以譴責官員的昏庸無能、只顧享樂、不體恤民情的可惡行爲；同時，他亦借無恥的官員來襯托大禹勤勞、刻苦、爲民請命的高尚品格。由此可見，作者是刻意運用對比手法去突出正義與邪惡之分、美善與假醜之別，繼而以醜惡的官員襯托美善的大禹。

本文的結尾筆鋒一轉，把腐化社會的特質注入禹的形象當中，使其更具時代感。治水成功後，皋陶下了一道命令，命百姓們學禹勤苦耐勞、爲民請命、堅毅不屈的行爲，否則，立刻就算是犯了罪。可是，樸素、耐勞的禹回京後，「態度也改變了一點了：吃喝不講究，但做起祭祀和法事來，是闊綽的；衣服很隨便，但上朝和拜客時候的穿著，是要漂亮的。」指出禹受腐化環境所侵蝕，因而逐步與歌舞昇平的帝王風習合拍。在此，魯迅總結出「一闊臉就變」的人性規律，當然，作者筆下的禹也只是一個治水的大員，並非聖人，故被周圍腐化環境所同化也是無可厚非的。而朱崇科學者則認爲禹這種行爲，充分表現了他對腐化環境的妥協：「這個貌似皆大歡喜的結局顯示了世俗強勁的衝擊力、官場的巨大吞噬力和禹的妥協」（《歷史重寫中的主體介入》）。

《理水》乃一篇借古喻今的故事，借古代大禹治水的故事諷喻三十年代的中國，故文中不免運用到有關大禹事跡的歷史材料。作者藝術地處理有關的史料，通過群眾的議論、傳言以及贊嘆的神色表述出來。在先前，人民沒有伸張正義的權利，連反駁一下學者的言論都要法律解決，但推翻了腐敗的統治後，人民便獲得了言論的自由「百姓們在宮們外歡呼，議論，聲音正好像浙水的濤聲一樣。」對於大禹的恩惠，百姓沒有忘懷，反而更加感激他，故關於禹的優美傳說也多起來，例如大禹變爲黃熊、忘八，捉住了無支祁等傳說。事實上，在《淮南子》中確有記述大禹變爲黃熊的事「禹治鴻水，通轅轅山，化爲熊。」

另外，作者運用了禹擒水怪無支祁的傳說，以敘述的方式啓示我們，革命是艱難的，就如轅轅山一般的險阻，無支祁一般的頑敵。《太平廣記》中載：「禹理水，三至桐柏山，驚風走雷，石號木鳴，土伯擁川，天老肅兵，功不能興。禹怒，召集百靈，授命夔龍，桐柏等山君長稽首請命。禹因囚鴻濛氏、商章氏、兜盧氏、犁婁氏，乃獲淮渦水神名無支祁。……禹授之童律，不能制；授之烏木由，不能制；授之庚，能制。鷗脾、桓胡、木魅、水靈、山妖、石怪奔號聚遠，以數千載，庚辰以戟逐去。頸鎖大索，鼻穿金鈴，徙淮陰之龜山足下，俾淮水永安流注海也。」說明禹到桐柏山治水時，遇到水怪無支祁作怪，霎時大風大雷，木石俱號，而土伯天老等鬼神竟助紂爲虐，阻擾禹治水。後來禹召集百神除妖，並命庚辰制服無支祁，以大索鎖其頸，復以金鈴穿其耳，把他鎖於龜山腳下。作者引用這則神話旨在說明無論治水或革命，群眾的力量是致勝之道，若能集合各方的力量，自然事半功倍。

作者亦採用了鯀化黃能、黃龍、白馬等傳說。《山海經·海內經》載：「黃帝生駱明，駱明生白馬，白馬是爲鯀。」指出鯀本是白馬，因爲同情受洪水影響的災民，於是竭力幫助災民脫險。另外，《山海經·海內經》亦載：「鯀死三歲不腐，剖之以吳刀，化爲黃龍。」說鯀死後化爲黃龍。而《國語·晉語八》則指禹死後化爲三足鱉：「昔者鯀違帝命，殛之於羽山，化爲黃能（三足鱉），以入於羽淵。」對於鯀死後化作甚麼，各家眾說紛云，但魯迅讓禹把它當謊言看待，不相信實有其事，並加以駁斥。

作者亦引用了堯的兒子丹朱太子的傳說。《史記·夏本紀》記：「毋若丹朱傲，維慢游是好，毋水行舟，朋淫于家，用絕其世，予不能順是。」說明丹朱為人驕傲暴戾，終日游手好閒，常常聯朋結黨胡作非為。而《路史·後紀十》亦載：「(丹朱)驚佷媚克，兄弟為閔。帝悲之，為制弈棋以閑其情。」指出丹朱生性高傲、善妒，常和兄弟爭吵。由此可見，丹朱品德甚劣，故堯最終將天下傳給舜，而非長子丹朱。

文中的奇肱國並非作者虛構出來的，而是有史書根據的。《山海經·海外西經》記：「奇肱之國，在其北，其人一臂三目，有陰有陽，乘文馬。」指出奇肱國的人只有一隻腳和三隻眼睛，常騎白色花斑馬。《博物志》載：「奇肱國，其民善為機巧，以殺百禽，能為飛車，從風而行。」《山海經·海外西經》亦曰：「善為機巧，以取百禽，能作風車，從風逆行。」《山海經圖贊》：「妙哉工巧，奇肱之人；因風構思，制為飛輪。」這些都說明了奇肱國的人擅長製造各種靈巧的機械來捕捉鳥獸，還能製造飛車。由於奇肱國人外貌奇特、善於製車，故魯迅在文中寫奇肱國人用飛車運送糧食給文化山上的學者，以象徵外來文化的侵略。從以上多個例子可知作者在創作本文前，已詳細搜集有關的神話材料，再運用自己的幻想力把材料融入故事之中，以達到古今融合的效果。

另一方面，作者在文中安排了一節戲劇性的衝突場面，使情節更為緊湊、扣人心弦。當大員們在水利局大排宴席、酒足飯飽之際，大禹和他的隨員竟突然出場，旋即「把大家的酒意都嚇退了，沙沙的一陣衣裳聲，立刻都退在下面」，這種爆炸性的場面成為全文的高潮所在，既為讀者帶來強烈的視覺衝突，亦為文章加添了張力。

為了達到嘲諷揶揄的目的，魯迅往往將人物有意識地世俗化、卑瑣化。這也是本文諷刺藝術的一個鮮明特點。如作者寫文化山上的學者一邊高談闊論種種學說，一邊吃炒面、麵包；寫烏頭先生宣讀論文時「把兩腳用力一蹬顯得非常用勁」、「鼻子紅到發紫」、「氣憤到連耳輪都發紫了」；寫水利局的官吏貪婪的大吃大喝，扔得滿地是啃光的牛骨頭；寫胖大官員攻擊大禹治水的新法時滿臉挂著油汗等等，這些描寫都突出了人物對食物粗俗的生理需求和丑拙的身體反應。這種藝術手法旨在給讀者滑稽之感，如同柏格森所言：「凡與精神有關而因卻把我們的注意力吸引到人的身體上的事情都是滑稽的。」（《笑——論滑稽的意義》）

從以上所見，《理水》一文篇幅雖短，但包含的諷刺內容非常豐富、絕不欺場，既能刺中時弊，亦能引起社會關注，故魯迅有「匕首」、「投槍」的美譽確是實至名歸的，就連毛澤東在論述魯迅對中國新文學的卓越貢獻時，也高度讚揚他那尖銳有力的筆鋒：「他用他那支又潑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筆，畫出了黑暗勢力的鬼臉，畫出了醜惡的帝國主義的鬼臉。」此外，作者在文中所運用的藝術手法亦絕不馬虎，而他那古今融合的寫作手法更得到各方人士的讚賞，如朱崇科言：「故事新編作為歷史重寫中一種獨特又頗具活力的書寫方式，在國內外都具有頑強的生命力和豐碩的實踐操作。」（《歷史重寫中的主體介入》）。另外，茅盾在《玄武門之變序事》中，亦高度評價這種手法：「魯迅先生這種手法，曾引起不少人的研究和學習。然而我們勉強能學到的也還只有他用現代眼光去解釋古事這一面，而他更深一層的用心——借古事的軀殼來激發現代人之所應憎與應愛，乃至將古代和現代錯綜交融，則我們雖能理會，能吟味，卻未能學而幾及的。」

參考資料：

1. 古神話選釋 長安出版社
2. 《故事新編》 魯迅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7
3. 中國古代神話 袁珂 商務印書館 1992
4. 中國神話故事 弓保安 未來出版社 2001
5. 中國古代神話傳奇 袁珂 重慶出版社 1997
6. 魯迅名篇分類鑒賞辭典 張盛如 康錦屏 北京中國婦女 1991
7. 中國神話學文論選萃(上) 馬昌儀 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1994
8. 《故事新編》的論辯和研究 李桑牧 上海文藝出版社 1984
9. 《故事新編》新探 山東省魯迅研究會編 山東文藝出版社 1984
10. 《故事新編》的思想意義和藝術風格 文藝月報編輯部編 新文藝出版社 1957